

二十世纪 中国史纲

[第二卷]

金冲及 著

二十世纪 中国史纲

[第二卷]

金冲及 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2卷 / 金冲及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5097-1007-4

I. 二… II. 金… III. ①中国—近代史②中国—现代史
IV. 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2619 号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著 者 / 金冲及

出版人 / 谢寿光

总编辑 / 邹东涛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zongbianshi@ssap.cn

项目负责人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徐思彦

责任校对 / 宋荣欣 桂 芳 陶 璇

责任印制 / 董 然 蔡 静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销售热线 / (010) 62142489 62164516

排 版 / 蒋宏工作室

印 刷 /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 / 700 mm × 1000mm 1/16

印 张 / 87.75

字 数 / 1136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007-4

定 价 / 128.00 元 (全四卷)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本卷目录

第九章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339

九一八事变，日本武装占领中国的东北，民众的抗日救亡怒潮步步高涨。蒋介石在日记中也曾多次对日本的侵略表示愤慨，但他依然把对付和消灭共产党放在第一位，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红军长征，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但长征开始时，是被迫的，而且是在极端险恶的情势下进行的。华北事变的发展，把南京政府逼到几乎无路可退的地步，不能不考虑大幅度调整它的对日政策。既然南京政府日益表明抗日的决心、同中共之间已开始秘密接触，为什么它在西安事变前夜还要调动那样多军队想来消灭共产党？

第十章 全民族抗战的爆发 403

七七事变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开赴前线，取得平型关战役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国民党军队中有不少爱国将士，他们在日军大举侵略面前，同仇敌忾，奋勇争先，以劣势装备和血肉之躯同优势装备的敌军拼搏，并取得台儿庄战役大捷。国民政府迁都的决定是值得肯定的，表明了“长期抗战”的决心。抗战爆发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国民党和它的军队的表现是积极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开始时只有几万党员和几万军队，但它充分发动并依靠民众，充满活力地向上发展。

第十一章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455

怎样看待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战场的关系？它们是相互补充、互为支持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一向宣扬民族失败主义，走上叛国投降；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仍坚持抗战，这是值得肯定的。当日本军事

进攻压力明显减轻后，蒋介石关心的重点就从对日作战逐渐转向防共反共方面。百团大战鼓舞了全国人民，使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说法不攻自破。延安整风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是使“实事求是”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使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更加成熟起来，不仅对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且对此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十二章 胜利快要到来的时候 525

一九四四年豫湘桂大溃退造成强大冲击波，使大后方人心发生急速变动，在相当程度上埋下了国民党政府失败的重要种子。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表面上看来依然是庞然大物，但它的政治地位和受民众信任的程度，却一步步衰落下去；共产党的力量却从小到大地迅速壮大起来，并且团结了越来越多的朋友。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成为中华民族重新振兴的枢纽，同时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十三章 和平建国希望的破灭 551

对待面临的严重的内战危机，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怎样的？它力争和平，也做了两手应对准备。需要用多少时间来“消灭”共产党？蒋介石的两个主要将领何应钦和陈诚的估计略有不同：何应钦认为要两年，陈诚认为半年就够了。

第十四章 人心向背的较量 579

人心向背，是最终左右一切的决定性力量。解放战争中，军事局势迅猛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内以学生运动为先锋的民众运动风起云涌，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人心的变动。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最坚决地、脚踏实地地在乡村中领导广大贫苦农民，把几千年没有能解决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根铲除；这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奥秘所在。民主同盟坚决拒绝参加国民大会，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动向，反映出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在政治态度上的进一步变化。

第十五章 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633

中国人在经历了那么多的屈辱和苦难以后，经过一百零九年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战胜曾经不可一世的内外敌人，取得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旧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了。

第九章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340
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	346
“攘外必先安内”和后两次“围剿”……	351
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	356
三十年代初的左翼文化……	361
华北事变和抗日救亡高潮兴起……	370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式……	382

中华民族在近代的遭遇真是多灾多难！在近代中国一切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九一八事变后，人们对这一点的感受越来越强烈。如果民族生存都无法保证，其他什么问题都谈不上。在外国侵略者中，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

前面说到，一九二七年日本田中义一内阁组成并召开东方会议后，对华已实行更积极的侵略扩张政策，并且以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地区作为重点。当张学良不顾日本的阻挠宣布易帜、服从中央政府后，日本便更加加紧策划武力夺取东北。东北上空，已是乌云密布，一场猛烈的暴风雨很快就要袭来了。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大衰退的背景下发生的。

一九二九年十月从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突然到来，迅速席卷全球，根本改变了原有的世界经济格局，造成全球性的经济大混乱。“到一九三二年夏天，许多国家的工业产量只及一九二八年产量的一半，世界贸

易减少了三分之一。”^[1] 在经济极度萧条的乱局下，人心动荡不安，富有侵略性的法西斯势力乘势在西方和东方迅速抬头。

这场经济危机给日本经济的打击是沉重的：物价暴跌，生产萎缩，失业增加，工资水平下降，贸易减少。“三十年代经济危机爆发后，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抑郁已久的对政党政治的仇恨，对海外殖民的渴望，对亚洲盟主的向往，以及对社会现状的不满等各种右翼思潮一下子迸发出来，为激进法西斯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充分的气候和土壤”。^[2] 日本成为国际法西斯势力在东方的战争策源地。

日本军部势力和关东军下决心要制造事端，武装夺取中国东北。他们处心积虑已久，并且断定西方列强此刻自顾不暇，不会也没有力量对此进行强力干涉。“在当时一触即发的形势下，关东军的计划是，一旦有了情况，先发制人地进攻东北军，占领长春以南的南满铁路沿线地带，以打开战略上的不利局面，寻求出路。”^[3]

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日本当局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又利用中村大尉刺探中国军事情报而被当地驻军捕杀一事，在国内进行狂热的反华煽动。他们在沈阳近郊不断进行军事演习。沈阳县长在八月报告：“日军近来在附郭一带演习行军，几乎无日无之。”^[4] 美国《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在八月初到东北采访。他写道：“按照日俄战争的战后协议，日本可在铁路区最多驻兵一万五千人。但照我个人估计，从大连到长春、从沈阳到鸭绿江北岸的安东（今丹东），各处散布的日军总数，已有四万人左右。”“日本军官个个激动不已，坦言要施以重击，将张学良的军队一举赶出满洲。”^[5] 空气中已到处可以闻到浓重的火药味。

九月十八日深夜十时二十分，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在沈阳以北不远的柳条湖地区的铁路轨道下埋设炸药，炸毁一小段路轨，反诬是中国

[1]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347页。

[2] 武寅：《从协调外交到自主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57页。

[3]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12月版，第6页。

[4] 《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212页。

[5] （美）哈雷特·阿班：《民国采访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128页。

军队所为。日本河本大作在远东国际法庭供认：“于九月十八日夜，派虎石台（奉天以北八公里）守备中队破坏柳条沟（引者注：当为柳条湖。下同）的桥梁”，“结果，只破坏柳条沟的一座小桥，然而它却成为九一八的直接导火线，使事变发展扩大。”^[1] 正在沈阳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立刻以它为借口，用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命令日军进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这种不宣而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从中日甲午战争以来的惯技。他们发动战争从来不需要任何借口，如果没有，也可以随意制造一个出来。第二天凌晨，他们占领了北大营和沈阳城。

日本政府紧接着从朝鲜等地调动军队大举增援，向东北各地推进，在四个月内强占中国一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的三倍。“从资源上说，中国失去了十分之七的大豆产额，失去了三分之一的森林，失去了三分之一的铁产，失去了三分之一的煤产，失去了十分之四的铁路，失去了五分之二的输出贸易。”^[2] 东北人民更陷入水深火热的亡国惨痛之中。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马占山率部在嫩江桥抵抗多日，终因孤立无援而失败，成为民众心目中的抗日英雄。各族民众相继组织抗日义勇军，奋战在白山黑水之间。大批难民被迫背井离乡，像潮水般涌入关内流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首充满悲愤的《流亡三部曲》的歌声，唱遍祖国大地，催人泪下，打动了无数中华儿女的心。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南京政府怎么办？它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对策。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在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八日（恰好在九一八事变整整一年前）率东北军主力入关，支持南京政府，关外兵力空虚，他自己也长期留住北平，注意力转向关内，更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九一八事变前不久，蒋介石在七月十二日致电张学良：“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3] 八月十六日又致电张学良称：“无论日本

[1] 《河本大作笔供》，《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8月版，第96页。

[2] 许涤新：《现代中国经济教程》，第20页。

[3]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607页。

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以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1]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仍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国际联盟的出面干预上，在日记中写道：“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2] 南京政府发表《告民众书》称：“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3] 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上，蒋介石宣布对日外交方针三原则的第一条就是：“解决东三省问题，不要脱离国际联合会的关系，我们要在国际力量保障之下，使日本撤兵。”^[4]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如此大片国土不经抵抗而沦丧，使整个中国为之震动。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使人们感同身受。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到史宅，史量才正和一群朋友打牌。我说：电报到了，日本兵在沈阳开火了，沈阳完全被占了，牌不好打了。一人说：中国又不是黄任之（引者注：黄炎培的字）独有的，你一个人起劲！我大怒，一拳猛击牌桌中心，哭叫：你们甘心做亡国奴吗？别人说：收场吧。”^[5] 全国民众群情沸腾，要求南京政府奋起抗日。他们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极为愤慨。在全国青年中拥有巨大影响的《生活周刊》，发表了原先在政治上还处于中间状态的主编邹韬奋所写《应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一文，满腔悲愤地指出：

“今日日本在东北无端占我土地，焚我官署兵营，解我军械，逮捕我官吏，惨杀我无辜，凡此种种亡国奴所受之至惨极痛之悲剧，若我们

^[1] 王芸生：《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第8卷，第236页。

^[2]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21日。

^[3] 《新闻报》1931年9月24日，《九一八——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3页。

^[4] 《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92年6月版，第201页。

^[5] 《黄炎培日记》第4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25页。

无彻底觉悟与坚决奋斗的抗御，则为我们人人及身所必须遭遇，妻女任人奸淫掳掠，自身任人奴役蹂躏，子子孙孙陷入非人的地狱深渊，皆非意想而为可能之事实！”^[1]

接着，他在下一期又发表一篇《无可掩饰的极端无耻》，痛斥当局奉行的不抵抗主义。他写道：

“其实这种‘不抵抗主义’就是‘极端无耻主义’，倘国民不加以深刻的观察和沉痛的驳击，则今后为国公仆负有守土之责者，贪生怕死，见敌即逃，不知人世间尚有羞耻事。”^[2]

银行家章乃器回忆他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思想状况：“我们在不久以前，还正在欢呼北伐的胜利，以为祖国从此可以转弱为强，中华民族吐气扬眉为期不远，我们这样生活在租界的人也可以不再受外国人的轻视、侮辱了。孰知大好形势突然逆转，国家又濒于危亡，悲痛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语形容的。”^[3]

这些都反映出九一八事变在中国思想界，包括原来政治态度比较温和的人中间发生的巨大变化。

各地民众把悲愤化为行动，掀起了好几年没有出现的全国规模的爱国救亡热潮。抗议的矛头直指南京政府。走在抗议前列的是青年学生。他们纷纷发表通电，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北平、上海、江苏等地学生到南京请愿。“沪宁铁路被上海来的学生堵塞了，津浦铁路也被那些成百上千向南京前进的学生们堵塞了。”^[4]各地学生一万人包围南京政府。抑制不住愤怒的学生殴打了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迫使蒋介石当面回答学生的质问。上海各界反日援侨委

[1] 《生活周刊》第6卷第40期，1931年9月26日。

[2] 《生活周刊》第6卷第41期，1931年10月3日。

[3] 章乃器：《我和救国会》，《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430页。

[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423页。

员会召开各界代表大会，到会五千多人，要求南京政府立刻下陆海空军总动员令，驱逐日军出境，恢复失地，团结力量一致抗日，并将该会改名为抗日救国会。上海工人成立日商纱厂工人抗日救国会、日商码头工人抗日救国会等，码头工人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驳船四十余艘也全部罢运。

面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蒋介石却认为：“上海学生来请愿者络绎不绝，其必为反动派所主使，显有政治作用。”“国民固有之勇气之决心早已丧失，徒凭一时之奋兴，不惟于国无益，而且徒速其亡，故无可恃也。”他在十二月九日日记中写道：“昨日上午政治会议，一般书生对万恶、反动、盲从之学生仍主放任，不事制裁。呜呼，天下事皆误于书生之手也，可不悲乎。”第二天日记中又写道：“晚会商镇压准备事。”^[1]十二月十七日，上海、北平、济南、苏州、南京等地学生举行爱国大示威，竟遭到南京政府军警的武力袭击。据各大学抗日救国会联合会致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文称：

“乃同学方抵中央报社附近，多数军警忽号声高鸣，或以木棍，或以刺刀，向同学冲锋肉搏，杀杀之声，不绝于耳。同学手无寸铁，即纷纷退避。乃该军警竟妄肆凶焰，大施毒手，对于无抵抗而正在退让之徒手青年同学不绝进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刺刀、枪柄、木棍、石子交加之下，死伤同学转瞬即达百人，甚至有于刺伤击伤之后，推入水中，复以巨石投击者。呜呼！全国人民年输数万万军费以养军人，乃军人对日帝国主义者则极端退让，从不敢以一弹一矢相加遗，而对于我爱国青年，则极尽其凶毒惨杀之能事，昔时万恶军阀所不敢为者，我青白旗下之军警竟悍然为之！”^[2]

南京政府对民众的爱国行动采取如此凶残的手段来对付，不能不激起人们更大的愤怒。

^[1]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28日、10月7日、12月9日及10日。

^[2]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80—81页。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以大无畏的气概，十二月二十日在上海《申报》公开发表题为《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文章。她写道：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在南京看到这种统一的第一个果实。仅在三天以前，在帝国主义使节的命令之下，这个‘统一政府’竟力图镇压爱国的学生运动。在不到十二个小时的时间内，兵士和流氓包围了学生，棒打枪刺，把他们像畜牲一样地赶出城去。学生多人死伤，据报另有大批失踪。”

“可以明白地看出，新的统一的政府是由日、法、英、美等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组成的，是服务于这群利害冲突的主子的，它将继续接受帝国主义者的命令，镇压中国民族求解放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群众运动。”^[1]

鲁迅在一年后一篇杂文中悲愤地写道：“我们还记得，自前年冬天以来，学生是怎么闹的，有的要南来，有的要北上，南来北上，都不给开车。待到到得首都，顿首请愿，却不料‘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头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枪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验尸之后，报告书上说道：‘身上五色。’我实在不懂。”^[2]

郭廷以指出：“此为九一八后，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第一阶段。这时学生尚乏严密组织，在政府压制之下，渐归消沉。”^[3]

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

尽管南京政府对日本侵略步步妥协退让，但扩大对华侵略以至企图独占中国是日本政府的既定国策，绝不会因南京政府的退让而有所改变。

一九三二年初，日本军队在上海地区制造了一二八事变。这是日方

[1]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85页。

[2] 《鲁迅全集》第5卷，第8页。

[3]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640页。

为了转移欧美列强对他们侵占东北的注意力而发动的，日本海军在这次事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纽约时报》记者阿班一月二十五日在黄浦江看到：“江面上泊满了军舰，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大多数是敦实庞大的日本驱逐舰，漆成铁灰。”“甲板上炮衣已卸去，炮口对准岸上。沿江的日本建筑都有日本海军陆战队把守。”“危机已有黑云压城之势。”^[1]

事变起因仍是日方预谋制造的。在日本驻华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策划下，日方指使流氓殴击日本僧人，并宣称其中一人死亡，借此挑起事端。一月二十八日，日军以保护侨民为名，突然袭击上海的闸北地区。当时上海驻军是有着较强战斗力的十九路军，总指挥是蒋光鼐，军长是蔡廷锴。蔡在抗战胜利前后写成的自传中说：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曾在二十四日告诫他：“现在国力未充，百般均无准备，日敌虽有压迫，政府均拟以外交途径解决。上海敌方无理要求，要十九（路）军撤退三十公里，政府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起见，不得已忍辱负重，拟令本军于最短期间撤防南翔以西地区，重新布防。望兄遵照中央意旨，想兄也同意。”但当日军突然发动进攻时，蔡却示意闸北驻军团长：“如日寇无故向我挑衅，我军为自卫计，应迎头痛击。”^[2] 战争于是爆发。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给了长期积愤的民众极大的鼓舞，受到他们大力支持。

这以前不久，宁粤双方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而合流，南京政府改组，由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一度任行政院长。一二八事变那天，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长。蒋介石也从家乡奉化返回南京，随后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二月中旬，日军向上海大举增援，兵力达到三万人以上。十九路军难以支持，电请南京政府增援。何应钦声称“抗日剿赤两难兼顾”，^[3] 不肯增派兵员。全国舆论为之哗然。南京政府才决定派张治中率领第五军在二月十五日前往增援，并声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1] （美）哈雷特·阿班：《民国采访战》，第149页。

[2] 《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75、277页。

[3] 《何应钦致吴铁城电》，《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

基本方针依然是求和。战斗持续到三月初。经过英、美等国调停，中日双方在五月五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死于战争的军人和平民共三万五千人。

九一八和一二八这两次事变，不过是开始。一切都紧锣密鼓地跟着展开。

日本侵占东北后，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制造了一个“满洲国”，以清朝废帝溥仪为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又把它改为“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公开表明把东北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去。他们以关东军司令官兼任日本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伪满的总务厅长官和各部次长都由日本人担任，来掌握这个伪政权的实权。东北已成为日本直接控制下的殖民地。

南京政府期望甚殷的国际联盟派出以英国人李顿为首的调查团，结果只说了一些空话，国联大会通过了接受李顿报告书的决议，声明不承认“满洲国”，可是并没有采取任何对日本的制裁措施，日本却强硬地宣布退出国联，气焰更高。

一九三三年一月初，日军攻占山海关。二月二十日，黄郛致蒋介石密电称：“日本战意已决，从前周旋接洽以为缓兵之计者，现已无此余地。”^[1]三月四日，日军以一支一百二十多人的小部队进占热河省会承德，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热河被宣布并入“满洲国”。日军已推进到长城一线。《大公报》载文写道：“躬赴热河、激励汤玉麟抗战之宋代理行政院长（子文），竟于失热之后，在三月十五日发表谈话，声称早已预言热河不过有一星期至十日可守，益证政府对于热河，根本自甘放弃。迨至热河全失，察冀成为第一线。”^[2]

中国驻热河的军队有八万多人，这次不战而失全省，再一次激起全国民众的极大愤怒。蒋介石乘此逼迫对此事负有直接责任的张学良辞职，他自己仍留在江西南昌指挥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由何应钦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黄郛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

[1] 黄郛日记，复印件，1933年2月20日。

[2] 《胡政之文集》（上），第439、440页。

委员长。

日军占领热河后，并没有就此停步，又挥师南下长城各口，威胁平津。中国军队在冷口、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等长城要隘进行抵抗。

把守喜峰口、罗文峪的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原是冯玉祥西北军的旧部。他们枪械陈旧而杂乱，弹药补充困难，很多步枪没有刺刀，在武器装备上无法同日本侵略军相比。但他们依靠高昂的士气，利用西北军原有特长，把大刀发给士兵。三月十二日，先头部队的旅长赵登禹召集前线团长会议说：

“我军装备差，火力弱，有兵无枪，有枪缺弹，只是每人大刀一把，手榴弹六枚。现在我们仅仅与强敌对战两日夜，就被敌机炮轰炸损失两个团的精华，我全军共有十个团，照此下去，只能与敌对战十日。我决心绕攻喜峰口敌人后方，痛痛快快地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叫他们知道我中华民族，还有坚决不（怕）死的勇敢部队。”^[1]

会后，团长董升堂在当天黄昏带轻装步兵出发，突然袭击日军骑兵宿营地。日军还在睡梦中，董团挥舞大刀，掷手榴弹，日军死伤五百多人。这一次胜仗，大大挫伤了原来骄横不可一世的日军的气焰。“大刀队”的威名传遍全国，大大振奋了人心。

南京政府这时也抽调徐庭瑶部第十七军三个师北上增援，在三月上旬赶到古北口防守。这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武器装备较好。有爱国心的将士们在这里顽强抵抗近四十天。接着，又在南天门阵地坚守到五月十四日。这是长城抗战中作战时间最长的战役。抽调这点兵力显然是不够的，但比起过去来多少是个进步。

经过激战，晋军商震部据守的冷口失陷，日军挺进滦河以东地区，宋哲元、徐庭瑶等部有后路被截断的危险，相继撤退。日军又攻陷密云、三河、香河、怀柔等地，日本十一架飞机在北平上空环绕飞行示

^[1] 董升堂：《夜袭喜峰口敌后》，《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453、454页。